探析“六”及“六安”的由来

杨四好

长期以来，关于“六”及“六安”地名的由来及读音问题，一直探究不止。这里，综合前人之论述，谈几点看法，与大家探讨如下。

有关“六”和“六安”的记载

地名是人们赋予空间上某一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者居民点的专有名称。关于“六”和“六安”地名的记载，如“禹封皋陶后裔于英、六”，“六”字首次出现于地名；《春秋·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史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多次出现有关“六”地的记载。秦置“六县”，“六”字首次作为县级行政建制名称。《项羽本纪》：“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

“六安”的名称则是始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取衡山国内六县、安风、安丰等县首字，别衡山国为六安国，“六安”二字首次作为地名使用，其后“六安”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据《五宗世家》载：“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元狩二年，淮南，置六安国，以故陈为都。”这些文献记录都反映了“六”和“六安”之名的由来。

关于“六安”之“六”字的读音，多数认为，“六”古音从“陆、录”，因而读作六(lù)安。其中，“录”是“彔”的异体字，“彔”是“渌”的本字，“渌”是“漉”的假借字，表示温润潮湿的意思，反映了古“六”地之气候。

关于“六”和“六安”的由来

我们知道，地形地貌影响地名的选择，地名能反映地形地貌和文化特征。一个地方的名称叫什么、是哪个字、读什么音，后来演化成什么字，或者另取什么名称等，都会反映当时当地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对事物的看法，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研究。这种研究有时候需要可靠的文献，有时候依靠考古新发现。

受晚更新世新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影响，淮河流域地质地貌呈现出山地、丘陵、平原和河流相间的特征，属于北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先秦时，六安境内河网密布，相对于河流、湖泊来说，高台地貌明显，必然影响六安先民的居住和生产生活，从而影响他们的思想认识，包括对地名的选取和内涵的朴素的认识。

关于六安的地名，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的观点，结合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我将“六”及“六安”地名的由来归纳为三种观点学说，即地形地貌说、阴阳易数说和文字演变说。

一是地形地貌说。在文明程度不高、人们思想认识还比较落后甚至比较迷信、崇尚巫术的先秦时期，往往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比如，依据地形地貌命名一个地方不乏有之。从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角度，六安先民首选栖居之地，应该会考虑到可以就地开展农耕、渔猎等生产活动，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早期语言文字的产生，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人们可能会根据高台等地貌特征进行取名，赋予这一地理区域一个专有名称，并有相对应的文字。这个名称和文字在古人看来，应该能够反映这个地理区域的特征，能够体现他们朴素的思想和认识，哪怕在那个时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有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字，只知道一个音，但是在思想上却拥有共同的认识，认为这个字、这个音体现了这个族群的信仰，这也是后来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认为“陆”这个字是“六”地最初的名字，是合理的。理由有二：

1.“陆”是单音节。由简到繁，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当然这个“简”和“繁”是指字的读音音节，而非字的繁简。夏商周时期，淮河流域的方国名字，多为单字单音节，如徐、六、任、葛、薛、鲁、江、黄、郑、蔡、项、宋、陈、杞、沈、许、房、息、蒋、莒、胡、萧、舒、英、宗、蓼、桐、巢等古国族。即便划分的九州也是单字单音节字，如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

2.“陆”与“六”的古义相近或相同。字的造型主要有象形、指示、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陆”字的造型属于会意。“阝(fǔ)”作左耳旁时，从阜(fù)，表示与地形地势的高低上下有关，从坴(lù)，土块很大。“坴”亦兼表字音。像“阡、陌、阵、险、陨、陷、阱等，都有土山、地势高低等含义。“陆”即指高出水面的高而平的地方。六安市裕安区现仍有一处古地名“陆集”，观察其周边地形，其北、西、南部地貌原先都是低洼湖泊之地，在处于中间一带高而平的陆地上逐渐形成集市，所以称作“陆集”。同时，“阝(fǔ)”作右耳旁时，从“邑”，表其封邑地名或姓氏属性，“邑”为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上为囗(wéi)，表疆域，下为跪着的人形，表人口。从“邑”的字多和地名、邦郡有关。如“邦”，从邑，丰声。古文从之、从田，会意字。与封字从之、从土同意。本义指古代诸侯的封国、国家。再如“郑”，形声，从邑，奠声。从邑，与地名、邦域有关，是周代诸侯国名。“郊”，形声。从邑，交声。从“邑”，表示与城廓、行政区域有关。上古时代国都外百里以内的地区称为“郊”。且“陆”“六”都是一种姓氏。由此可见，“陆”“六”二字都有表其封邑地名或姓氏属性的含义是合情合理的，古时二者互为通用也是可能的。

霍邱昊天观遗址(新石器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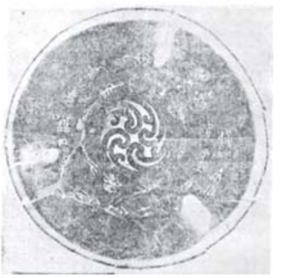
霍邱县中洪城孜遗址(新石器时期)

二是阴阳易数说。依阴阳理论，六是阴数，《易》卦之阴爻称为六。那么，“六”为什么是阴数？《说文解字》曰：六，《易》之数，阴变於六，正於八。从入从八。凡六之属皆从六。个人认为，还应该从《易经》中坎卦的卦象加以分析。“坎”指低陷不平的地方、坑穴，卦象是水，指水长流不滞，《易经》中坎卦的符号为“☵”，其中中间长线“—”象征中流，两边短线“- -”象征涌向两边的支流或波纹，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像是一条河流。《河图》曰：“天一生六，地六成之”，意思是天数为一，它生成了水；地数为六，它承载着天上下来的水。同时，坎卦还表示危险和困难。因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原因，跨越一道河流往往面对着诸多危险和困难，特别是江淮之间，河网密度，灾害频发，取“六”之名，也是对地形地貌的一种诠释，更是对水和河流的一种认识和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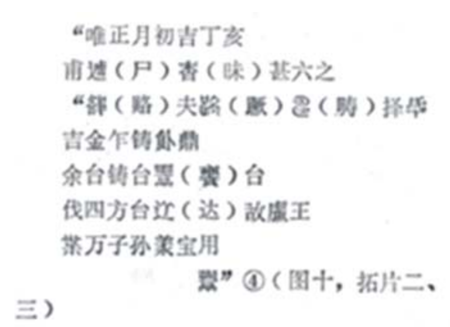
因古人对天地、自然抱有崇拜敬畏之心，“六”作为数的概念，还对应东、南、西、北、上、下(上下用以指天地和宇宙)六方，具有某种神秘力量和意义。古人取“六”，当有天地和东南西北六方之力量的意义。或许汉武帝在取“六安”之名时，除了采取合词法以外，就是考虑了《易》之数的含义。同时，据《说文解字》对“安”字的释义：静也，从女在宀下。本意为安定、平安。而《尚书·皋陶谟》言：在知人，在安民。那么，汉武帝取“六安”之名，也正好因应《皋陶谟》篇里安民之意，希望“六安”之地安定太平，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同时，由于受思想认识的影响，古人往往对某些事物包括数字有特别的理解和寄托，因而产生一些令今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据说秦始皇一匡天下，以为秦代得水德，因此“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水之数为六，所以上列事物都与六有关。更进一步，还与六的倍数有关，如销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刻石以四字一句，三句一韵，一韵十二字，泰山、芝罘、东观三刻石都是三十六句，琅邪、会稽二刻石都是七十二句，无不为六的倍数，这就是《史记》卷28《封禅书六》所说的“度以六为名”的意思。也正因这个缘故，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郡不少，一郡不多。其他事物的数是一经确定就不再变的，而郡数却不一样，是会浮动的。如始皇三十三年北逐匈奴，南平南越，置九原及南海三郡，就明显突破了三十六郡的格局。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由于秦始皇重新疆理政区，已有许多新郡从旧郡之中析置出来，增加了郡的总数。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就载有三十六郡以外的衡山这一郡名。衡山郡是从幅员辽阔的九江郡析置出来的。虽然郡数可以浮动，但六的倍数却仍要保持。据王国维考证，秦一代最终总郡数为四十八。(王国维：《秦郡考》)估计其先从三十六郡发展为四十二郡，所增加的六郡都从旧郡中分置；秦始皇三十三年开疆拓地置四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九原郡)以后变为四十六郡，于是又在内地新置二郡(陈郡、东海郡)，以足四十八郡。是否巧合，今已不得而知。

三是文字演变说。虽说，“六”古音从“陆、录”，读作六(lù)安。但是怎么从“陆”到“六”呢？我总感觉这个过渡的有点突然，甚至怀疑，“六”古音从“陆”有点牵强，中间可能还有一个衍变、过渡的过程，只不过我们还不甚了解罢了。据《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在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中发现甚六鼎、甚六镈、甚六钟等器物时，其中“甚六”二字，青铜器铭文的写法是“▨▨”即“遣邧”，同时，还见到“舍王之孙”铭文，舍王即舒王，也是目前仅见有“舒王”二字的器物。我认为“⿰六阝”这个字对认识“六”字的来源或许有帮助。“六”在楚文字里曾写作“⿰六阝”，它有异体形式“郩、⿰录阝”，“六、录”为声，从“阝(邑)”，表其封邑地名或姓氏属性。这里，大胆猜想一下，“录”是“⿰录阝”的简写，“六”是“郩”“⿰六阝”的简写，但本义未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写的方便，字型逐渐向两个方向进行演变，并最终演变成“六”这个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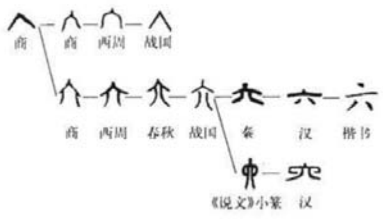


鼎腹内及盖内皆有铭文，腹内铭文已锈蚀，仅存“择……鼎……王……”数字，与盖内铭文相较，盖内皆有相同的字，可能内容相同。盖内铭文八行，四十七字，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
甫遽(尸)耆(昧)甚六之
“[illegible](赂)夫[illegible](厥)[illegible](聘)择[illegible]
吉金乍铸[illegible]鼎
余台铸台[illegible](襄)台
伐四方台辻(达)敌虞王
枼万子孙羕宝用
[illegible]”④(图十，拓片二、三)

关于“六”的文字演变及其含义，还有一说，即“六”是一个象形字，本义为草庐，像搭棚于地面，后演进为突出了棚壁之形。商代甲骨文写作“⋀”，像搭棚于地面，后演进为“六”，突出了棚壁之形，后人再加“卢”(器皿中装着兽肉)另造“庐”代替，表示生活栖息的空间，如《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指田中有屋。《荀子·礼论》：“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认为“庐”是房屋的意思。因“六”是“庐”的初文，“庐”和“六”古音相近，所以假借为数词“六”，但读音依“庐”，写作六(lù)。秦代小篆中将上面作屋顶状的两笔向内弯曲，隶变后则变为点和横，再后形成现在的楷书“六”。



同时，“六”作为一个封地或者地名，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曾多次出现，写作“⋀”。传世有一件录伯簋盖，年代为西周中期后段，据郭沫若等研究考证，认为录伯簋的“录”即古六国之“六”，位于今安徽六安北，属偃姓国。“录”(来母屋部)与“六”(来母觉部)古音近同。

这里，关于“六”字的演变，笔者认为，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从简到繁还是从繁到简？按照以下哪种方式演变更合理？

一是从“陸”“郩”“⿰六阝”再到“六”？(个人认为“⿰六阝”“郩”是的简化)还是从“六”到“⿰六阝”“郩”“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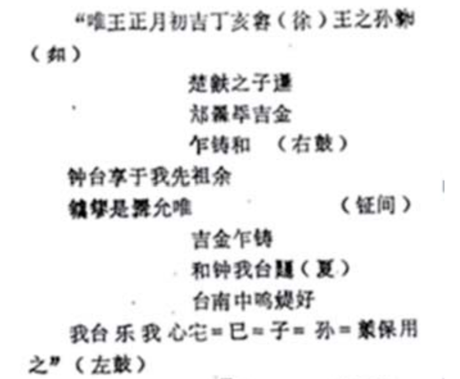
二是从“⿰录阝”到“录(彔)”再到“六”？还是从“六”到“录”再到“⿰录阝”。

三是从“⋀”到“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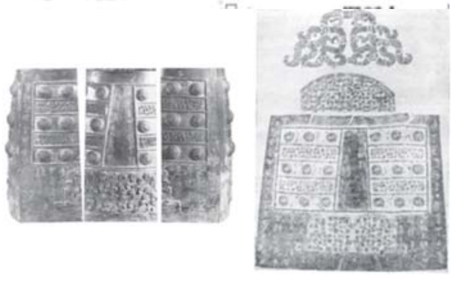
事实上，字形的不同演变过程，则可能会反映出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假如说，是从“郩”到“⿰六阝”再到“六”，说明六安先民在起这个名字时，有可能就已经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地形地貌，且当时有可能就是将此地作为一个封地封给某位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录伯，因为“郩”左边从“⿱六六”“六”，表示很多高地，右边从“阝(邑)”，表示封邑。若是从“六”到“⿰六阝”“郩”，则表明“六”字出现更早，因后来作为封邑封给某人，故加“阝(邑)”，这也说得通。

假如说，是从“⿰录阝”到“录(“彔”)”再到“六”，同样说明六安先民在起这个名字时，是考虑当时一些社会生产生活景象，思想来源于生产实践，比如，“彔”是“渌”(假借字“漉”)的本字，而“录”是“彔”的异体字，本意是用辘轳和水袋从井下汲水，有“取”的意思，而右边从“阝(邑)”，也说明此地可能作为封邑封给某人。同时，也反映了井在那个时期已经普遍存在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过，通过对出土器物的时代先后以及文字的演化过程分析，六安名称的由来，特别是“六”字的演变，个人倾向于是从“陸”“郩”“⿰六阝”再到“六”的演变过程。理由是：从已发现的器物时代及文字字形来看，我们所说的“陆”“录(彔)”“六”等字，都是后来简化的字，相对于器物上的字形或甲骨文，不能反映字的真实演变过程。如商代殷墟甲骨文及录伯戓簋盖中的“录”字，多写作“▨”，后逐渐简化为▨和▨。特别是▨字，从字形并结合所处古遗址的地形地貌来看，字的上半部分为圆形，代表遗址形状，且位于北面，四周四点代表“水”，字的下半部分有一条长线，则代表出入聚落的通道，有的还在聚落周边人工开挖护城河池，以作防御，这些符合古代大多数聚落选择依水而居的选址特点。“⿰六阝”“郩”始见于1984年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曾出土甚六鼎，即“▨⋀▨(遣邧)”鼎。“陆”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陸，“六”字见于商代甲骨文。从时间先后看，陸、⋀二字出现时间在“⿰六阝”“郩”之前。▨▨▨(录、彔)与“六”的字形相差较大。同时，考虑到甚六鼎中同时出现舍王(舒王)铭文，且舒与六地缘相近、关系密切，舒地与六地都是古国或封邑，则陸“⿰六阝”“郩”三字结构与“六”的演变关系可能更接近，三字的内涵与六字更接近，由此认为，“六安”之“六”字当是从陸“⿰六阝”“郩”三字演变而来的可能性更合理。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舍(徐)王之孙[illegible]
([illegible])
楚𢼸之子遗
[illegible]择吉金
乍铸和　(右鼓)
钟台享于我先祖余
[illegible]是[illegible]允唯　(钲间)
吉金乍铸
和钟我台[illegible](夏)
台南中鸣媞好
我台乐我心它=巳=子=孙=羕保用
之”(左鼓)



总之，“六”字的读音及其作为地名的由来，应是六安先民结合自然地理地貌的特征，从生产生活实践中感悟，并赋予其一定的含义，运用事物意象和合体造字等形式，创造出“陸”“六”“⿰六阝”“郩”“⿰录阝”“录”“▨”等文字，其中经历了字形的变化、字义的转化、书写的简化等过程，六地先民最终选择“六”这个简单的字形和字音且内涵丰富的地名。这既符合汉字演化发展规律，也反映出六安先民的智慧。

至于“六安”为什么读作“lù an”，当是古文字衍变以及读音的问题，因“六”与“陆、录”等同音，“陆、录”在普通话中读lù，地名“六”仍与它们保持同音，也合情合理。同时，从文字演变来说，汉字中的“陆”“录”同音，均有水边高台之义。进而推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出土的▨▨▨▨(录伯戓毁)盖铭文中是▨(录)而非“六”的原因，从字形来看，中间表示高台，四周是水，既形象，也贴切。

六安市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当前的六安，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积极构建大别山红绿交融、江淮分水岭、主城区、淮河水乡四大文化旅游片区，奋力打造全国红绿融合发展示范区、长三角高品质休闲度假康养旅居目的地和上海市、合肥市的最美“后花园”，着力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提高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市和高品质的旅游强市。

(作者系市文保中心(皖西博物馆)副主任)

杏坛沧桑六安师范忆怀

荣维新

艺高方为师，学海苦作舟

针对当时基础教育的特殊需求，六安师范践行的办学理念是“多能一专”，要求每一位学生，门门都要学，样样都要会，且有一门技能学有所长，拿得起、过得硬。人称这种教育为“万精油”模式。师范学习那会，文化课、专业课学习学校要求极严，近似苛刻，不及格、不达标，是毕不掉业，拿不到证书的。“小三门”(音、体、美)教学也相当正经。那时候，要是你“小三门”中有一门能拿得出手，定会招致众人的关注与羡慕。倘若样样拎得起来，那你在班里、年级，乃至全校可就是个“名角”了，准会倾倒一大片。平时走在校园中，同学们对你的回头率都会骤增好几个百分点，人气爆棚。

当时，教我们音乐课的是康正南老师，一位治学严谨的音乐权威。他在全校、全地区，乃至安徽省音乐教育界，也算得上是大师级的“天花板”。康老师平时不苟言笑，总是绷着脸，要求极严。不少人和我一样天生五音不全的同学，上他的课都会提心吊胆。每逢考弹钢琴、练试唱，看着一串串“小蝌蚪”便会一脸茫然。康老师常手把手地教我们打拍子，摁琴键，耐着性子，不厌其烦。我们也是手脚并用，麻虾过河慌着大爪子，弹得断断续续，唱得结结巴巴，不是跑偏了调，就是弹错了音，弄得康老师哭笑不得。不过，他总是操着浓重的方言，一个劲地鼓励：“嗯嗯嗯，有进步，弹完就好，能唱就行，努力努力！”康老师的“宽宏大量”，常羞得我们这般天生缺乏音乐细胞的“乐盲”们，恨不得钻进地裂里。感恩康老师的“仁慈”，让我们三年的音乐学习，在这般近似荒诞的煎熬中画上了个幽默的休止符。

提起体育课，那更是要命！各项考核靠的可都是“硬功夫”。最怕便是那跳山羊、单双杠什么的。天生缺乏平衡的基因，那是真的玩不来。每每上此类项目的体育课时，都是忐忑不安，憋出一手心冷汗。幸运的是，教我们体育的朱伟安老师，宅心仁厚，菩萨心肠。虽然平时要求严格，但是真到实际考核时，却多了分“人性化的关怀”。只要态度端正，平时认真努力了，多半还是能修得“正果”的。

至于美术课，对我来说，是从零基础学起，也只能是上鞋不带锥子——真(针)干。开始学习美术字、图案制作、简笔画什么的，也还能“勤能补拙”，勉强跟上趟。后来学习素描、国画、水彩写生等就越来越“南郭先生”了。虽然花费了比别人一倍，甚至多倍的功夫，但终因天赋的不足而被甩下一大截。尤其是素描，面对着冷冰冰的石膏塑像，只能是“相看两都厌”。什么透视、明暗、立体感什么的，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头雾水，怎么画都不会。

教我们美术的是方衡、蒋纯尧两老师，在绘画方面均造诣颇深。方老师向来幽默风趣，课也上得妙趣横生。每每布置完素描作业，他便走下讲台巡视。看他走到跟前，我便抓起画笔装模作样掸上几笔；等他一转身，我便又磨起了佯工。好不容易捱到下课时，我立马便“虚心”请求高手“帮助”，草草交差了事。户外写生，对我来说，权当是室外鉴赏课了。至于作业任务的完成，那也只能拿来同学的“样品”，照阴凉画葫芦。

蒋老师教我们工笔画，极其细腻认真，可我还是因先天不足而“涛声依旧”。作画时，便请已画好的同学先帮我勾勒好线条轮廓，然后自己学着涂色，竟偶尔获“优”。我简直为自己的“天才”而庆幸！

要说最感兴趣的，恐怕要数文选与习作。这得益于刘运好和黄伟两位恩师的启蒙。刘运好、黄伟，才华横溢，能说会道，系老六安师范有名的“四大才子”之二。听他俩的课，兴趣盎然，堪称是一种艺术享受。

黄伟带过我们“语基”，古文字功底扎实，才思敏捷，尤其擅长文学评论。曾记得，当时学校曾组织学生集体前去百花电影院观看了电影《红高粱》。回来后，学校组织开展了一次《红高粱》观影分享会。黄伟老师作了精彩的影评演讲。他的点评观点新颖，视角独特，把剧情剖析得丝丝入扣，把人物评价得入骨入髓，把影片的艺术价值诠释得酣畅淋漓，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子”。我们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掌声经久不息。打那起，黄伟的名字连同他的文学才华便在我们的心里悄然生了根。

刘运好古文学的功底也好生了得，造诣极深。诗词歌赋，古今名著，他都能信手拈来。大到经、史、子、集，小到“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民间佚名窑瓷小诗，天地皆为他用，左右皆是他源，大开大合，绘声绘色，侃侃而谈，听得我们是如痴如醉。至今还记得刘老师给我们上的一节林黛玉《咏海棠》赏析：“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他把诗歌的背景、意韵、海棠与黛玉间的契融，解读得细腻婉约，把“偷来”“借得”用词精妙的神来之笔，剖析得绝妙精伦，让我们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中华古诗词的魅力。从此，我也爱上了古诗词。刘老师的课上得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有生趣。听他的课是一种鉴赏，更是是一种美的享受，期待满满，收获满满，每回未曾令我们失望过。

当时的六安师范学校除了像黄伟、刘运好等这些“才子”外，更有方衡、蒋纯尧、邹有年(教学化学)、李世俊(教学英语)、查福民(教学数学)、王乃富(教学思政)、朱伟安(教学体育)、史德民(教学体育)、杜方明(教学地理)、张德华(教学生物)等一大批中、老年名师教授，也有阮成武(教学教育学)、王群(教学思政)、郑敏(负责学校团委工作)、盛敏(教学“语基”)等后起青年才俊才女，还有诸如“金龟子”刘纯燕等一大批中央讲师团精英的加持。可以说，当时六安师范学校的师资配备算是步入了“黄金时代”，教育教学工作也是迎来了辉煌的高光时刻，饮誉江淮。

课余亦精彩，快乐嘉年华

六安师范学校始终秉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校风，践行“团结、勤奋、求真、献身”的校风，积极倡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理念，各项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双基”并进，有声有色。

学校每年的秋季运动会开得轰轰烈烈，有规模、上档次、出成绩，尤其是开幕式浓重规范，仪式感满满。学校全面参与省、内外中等师范学校开展的各项活动，成绩斐然。学校曾成功承办过“江淮地区中等师范学校排球联赛”，以其优雅的校园环境、高尚的文明素养和出色的体育竞技水平赢得了前来参赛的诸如滁州师范、马鞍山师范、舒城师范等省内外各兄弟学校的一致好评。

学校也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节，猜灯谜、诵经典、唱红歌，集知识性、娱乐性和文化性于一体，有创意、有亮点，丰富多彩。开展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也是学校常态化的课外活动之一。我们在师范读书那会，学校条件相对简陋，每逢国庆、中秋、元旦等重大节日，学校常会在食堂对面的“草棚”大礼堂里举办活动；要不，就是在琴房和水杉林之间的水泥球场上进行。无论是室内，还是露天，同学们每次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别看大家平时都是埋头学习，斯斯文文的，可参加起活动来丝毫不逊色，个个都是八仙过海，多才多艺。简陋的草堂、简易的舞台，呈现的却是一幕幕精彩。弹吉他、吹口琴、说相声、扮双簧、拉风琴、变魔术、诗朗诵、独唱合唱、载歌载舞。同学们的表演才艺及整个晚会的质量，相较于同类中专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一代中师生的才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让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八八年学校举办的“庆中秋交谊舞大赛”。比赛好像是中秋之夜，是在水泥操场上举进行的。天上皓月当空，底下乐声悠扬，场上人头攒动，喜气洋洋。来自各班的“舞林高手”，无论男女，一改平时的青葱羞涩，淡化了彼此间的性别隔阂，手挽手、肩并肩跳起了《阿里山的姑娘》、《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等。歌声深情悠扬，动作整齐划一，舞姿款款翩翩，高潮迭起。掌声、喝彩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整个校园都沸腾起来。

木铎金声里，桃李满天下

星霜荏苒，居诸不息。当年的青葱少男少女，今天早已是为人师、为人父、为人母。不变的是，每个人的骨血里仍流淌着六安师范的基因。莘莘学子，告别了母校，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一路芳华，浓怡感恩。八九十年代，人才紧俏。早期毕业的六安师范的学子，弃教从政者为数不少。少数学生经商下海，发了家、致了富，成了富甲一方的商贾名流。绝大多数学子，走出校门，奔赴皋城四面八方，点亮着城镇，扎根于乡村，勤耕耘织，一路汗水，一路花香，撑起了皖西教育的一片蓝天，振兴着基础教育的千秋工程，不负恩师母校，不负青春韶华。

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安师范，就没有皖西教育的今天；没有六安师范的学子，就没有六安基础教育的一片艳阳天。“前世”曾精彩，“今生”更辉煌！六安师范学校，这所曾拥有一百多年校史的“教师摇篮”，在皋城大刀阔斧的现代化进程中，潇洒地作别昨天的辉煌，把自己的丰碑刻进皖西大地的每一寸沃土……　(下)